

郑观应·孙中山·包惠僧

梦 柳*

郑观应

郑观应(1842-1921),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者。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中年在澳门定居。曾当过英商宝顺、太古洋行习买办,捐资得道员街。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创办过贸易、航运等企业。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学习西方原则,主张“设议院”。他认为“外洋以商立国”,“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提出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的对策。强调“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他指出“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他主张发展机器制造业。要求清王朝实行护商政策,指出官“朘削”、“遏抑”商业是中国商务不能振兴的根本原因。提出采取保护关税,海关不用洋人、裁撤厘金、允许商人自由投资、商人造铁路由国家保付利息等有效的护商措施。

郑观应先生忧国忧民、竭力挽救中国的思想集中抒发在他辑写的著作《盛世危言》之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改造中国的三大纲领:“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材;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在政治上强烈要求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制,及相应地进行政府吏治、财政收支等一系列民主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郑观应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力招集商股为主,必要时也引进外资进行“华洋合办”,以加快实业建设的步伐;在外交方面,他主张以不断加强的实力作后盾,运用公法,进行平等外交;在军事方面,他对建立强大的新式海军和陆军,提出了设想和方案。

郑观应认为,要完成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必须培养出一大批与改革事业相适应的各种专业的新型人材。他说“国之盛衰系乎人”,“有治法必须有治人”,所以他始终把培养人材放在首要的地位。

以《盛世危言》为主的郑观应著作中,对女教、女权、社会慈善福利、社会风气的改造,乃至流民和犯人的改造教养都有论述。郑观应的救国思想,有强大的生命力,对目前中国的改革仍有现实意义。

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大学时代与郑观应有密切的关系,郑观应是孙中山的同乡,他比孙中山年长24岁,因为他既是一个“熟谙洋务”的官员,又是一个颇具爱国思想的维新人物,所以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尊敬。由于孙中山的好友陆皓东早在上海读书时与郑观应有交往,孙中山通过陆皓东的介绍认识了郑观应,^[1]成为忘年之交。

1885年,因太古洋行总买办杨桂轩亏欠巨款,郑作为杨的保荐人受累,被扣留香港半年,此后

* 澳门作家,澳门文化司署高级技术员。

[1] 甘乃光编:《孙中山先生文集》,广州,1925年版,第122页;《国父之大学时代》,第149页。

即在澳门定居。从事《盛世危言》的编写工作。这段时间孙中山正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每逢假期孙中山由香港回家,必经澳门与郑观应交谈对时局的看法及学习西方的主张。

发展农业生产,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改造农业,也是孙中山和郑观应共同关注的问题。大约在1891年,孙中山撰写了一篇专门论述农业的文章,该文经郑观应酌加修改后,以《农功》为题辑入《盛世危言》一书。^{〔2〕}孙中山在文中指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3〕}

1894年,也就是孙中山大学毕业以后的两年,郑观应曾函请洋务官员盛宣怀向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推荐孙中山,其中提到孙中山在振兴中国农业方面的抱负,称孙中山“有志农桑生植之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4〕}由此可见郑观应对孙中山的赏识,称得上“慧眼识英雄”。

孙中山先生在澳门与郑观应交往的过程中研究西方的经济政治理论和近代科学知识,寻求改革中国的具体办法。随着研究深化,孙中山先生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不断发展和日趋成熟,他在郑观应《盛世危言》“三大纲领”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深化,充实了具体的内容和实施的方法,形成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四大纲领。并上书李鸿章,希望清政府能够采纳,进行改革。在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孙中山便观点鲜明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革命纲领,组成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政党“同盟会”,为推翻封建的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奠定了基础。

中国现代史上另一位风云人物毛泽东也读过郑观应辑著的《盛世危言》,这本书曾经对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1936年美国著名的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的陕西省北部访问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他的青少年时代:“我常常夜里很晚,把我房子里的窗户掩盖上,好使我父亲看不见灯光。用这样的方法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书我非常喜欢。它的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由于缺乏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汽船等等。他们想把这些东西,介绍到中国来。我父亲以为读这些书,只是耗费时间,他希望我学一些像经书这样的东西,可以在诉讼中胜利。”^{〔5〕}《盛世危言》使毛泽东开阔了眼界,他不再满足于故乡的小天地,他要寻找一个新的世界。

毛泽东对斯诺说:“《盛世危言》在我脑子里鼓舞起恢复我的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我在田地上的工作。自然我父亲反对我这件事。关于这件事我们常常口角,最后我从家里跑开了。”^{〔6〕}

美国著名的学者R·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传》中也明确指出:“一本倡导改良呼吁技术进步的书——《盛世危言》,使毛泽东形成了这样的思想:为了拯救自己的文明,中国必须借鉴西方的东西。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具有改良思想的买办。他使毛泽东产生了这样的考虑:为了中国的命运,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7〕}

〔2〕《农功》一文为孙中山所作,乃是根据国民党元老陈少白、戴季陶、冯自由、吴稚晖等人的记述(他们有的是转引自孙中山本人口述)。

〔3〕《盛世危言》卷三,光绪二十年刻本。

〔4〕夏东元:《郑观应传》,上海,1998年版,第110页。

〔5〕(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译本第89页。

〔6〕同上。

〔7〕(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Harper & Row, Publishers,1980年第一版,中文译本第13页。

从此,毛泽东离开了故乡——韶山,开始了他传奇式的“流浪”和“造反”生涯。

改良主义在19世纪末叶的中国是一种进步的思潮。郑观应作为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政治上效法西方,进行根本改革,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这些思想对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和毛泽东都起了积极的影响,有很大的启蒙作用。

郑观应和《盛世危言》对近百年的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不能低估。中外专家学者们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先知”——郑观应的评价越来越高。

郑观应在澳门居住期间撰写并完成了其名著《盛世危言》,澳门的学者近年来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举行了专题学术研讨会。澳门社会各界普遍要求将郑观应在澳门的故居——“郑家大屋”妥然地保护,将来条件成熟时改建为纪念馆和博物馆。

孙中山

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家庭与澳门有密切的关系。澳门是他走向世界的门户,也是他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基地。

位于澳门文第士街一号的小楼是澳门国父纪念馆,陈列着许多孙中山先生和家庭的珍贵文物和丰富的历史图片。国父纪念馆的室内陈设都保持着历史风貌,通过这些实物和图片,观众们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国历史上重大的事件,清晰地看到孙中山先生一生的丰功伟绩、伟大思想和艰难的革命道路。

孙中山先生于1866年11月12日诞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户农民家庭里。离翠亨村最近的海港城市就是澳门。历史上,翠亨和澳门同属香山县,两地相距35公里,步行半日即可到达。孙中山先生的父亲孙达成,早年曾经在澳门学过裁缝,又在板樟堂街的一间鞋店当鞋匠,后来才回乡务农。板樟堂街至今还保留着许多鞋店,这个地区是澳门鞋店最密集的地方。

孙中山先生的兄长孙眉晚年在澳门定居,在澳门逝世后安葬在故乡翠亨村。澳门国父纪念馆的前身,就是孙眉所建。

孙中山的元配夫人卢慕贞和女儿长期居住在这里,卢慕贞女士是一位善良的中国女性,她一生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由于孙中山先生长期在海外从事革命,卢夫人承担了孙中山先生的全部家务,含辛茹苦地养育子女,分担孙中山先生的忧虑,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操劳了一生,默默地贡献她的全部精力。澳门国父纪念馆中陈列着卢夫人亲手缝制的衣物,其中有她为孙中山先生缝制的衣衫,在这一针一线中倾注了她的无限深情和心血。

卢夫人于1952年在澳门逝世,原安葬于澳门旧西洋坟场,1973年迁葬到澳门函仔岛的孝思坟场。卢夫人安息在苍松翠柏之中,肃穆的墓地和碑文表达了澳门人对孙中山先生的卢夫人的崇敬和怀念。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家庭与澳门有非常深的渊源。

澳门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口,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重要城市。在孙中山先生的青少年时代,澳门妈阁庙前的内港,是他出国和学习的必经之地。

孙中山先生12岁时随母亲离开翠亨村,经澳门前往檀香山。

孙中山先生到的第一个城市是澳门;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文化也是在澳门。首次出国使他大开眼界,也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孙中山先生所叙述的:“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腐朽的满清政府利用封建迷信,麻醉和控制人民。孙中山先生17岁时,和同学陆皓东反对封

建迷信,损毁村庙北极殿中的偶像,以致遭到保守势力的责难,被迫离乡,再次经澳门到香港读书。当孙中山先生在澳门内港登上轮船,他遥望十字门的海面,思绪万千,下决心用“科学和民众”唤起民众,拯救多灾多难的祖国。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期间,澳门成为他来往香港、翠亨之间的通道和居留地。

在澳门国父纪念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珍贵的照片,它真实地记录了孙中山先生和同学陈少白、杨鹤龄及尤少纨(即尤列)的革命友谊。在这个时期,孙中山先生经常和他们在澳门水坑尾青砖巷口的楼中,畅谈时局,互抒救国、改革的抱负,因言论激烈而为时人称为“四大寇”。

今天,我们站在水坑尾巷口仰望这些古旧的窗口,仿佛还能听到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同学们激昂的声音……

孙中山先生在澳门期间,发表了“致郑藻如书”。这封信是1890年他写给以“通时务”著称的香山籍退职官吏郑藻如的。孙中山在信中呼吁效法西方,进行社会改革,主张兴办农桑,禁绝鸦片,提倡普及教育,在香山实行后再向各地推广。如今这封信成为孙中山全集开卷的第一篇文章,这封信显示出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在澳门孕育成长。

孙中山先生在1891年前后以“孙翠溪”的笔名写了两篇论文《农功》和《商战》,为近代思想家郑观应所赏识,收录进名著《盛世危言》之中。孙中山在澳门与郑观应交游甚密。1894年孙中山从上海经日本抵檀香山,由郑观应设法代领出国护照。

去香港求学期间,孙中山先生经常回到翠亨村,他把学到的科学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之中。现在翠亨故居的房屋,就是当年孙中山先生亲手设计而成的,从这幢房屋的结构、方向和窗户走廊的安排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孙中山打破中式建筑的传统旧习惯,吸收了西方建筑的优点,阳台走廊独具一格。就在这座房屋的二楼,孙中山先生和陆皓东彻夜长谈,讨论政治,研究改革,并写下了著名的“上李鸿章书”。

1892年7月,孙中山先生以“最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华人西医院(即今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教务长康德黎医生(DR. JAMES CANTLIE)非常满意他的中国学生。

同年9月,孙中山先生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席,他是澳门第一位华人西医,也是镜湖医院设西医的开端。陈列在翠亨中山故居纪念馆和澳门国父纪念馆的一些器皿铁床、医疗器械和木桌都是孙中山先生在澳门镜湖医院行医时使用过的。

孙中山先生在澳门行医期间,他还两次向镜湖医院借款,在草堆街84号开设中西药局,他在镜湖医院义务行医,他开设的中西药局免费供应药品。

孙中山先生医术精湛,擅长外科和治疗肺病,行医“不满二、三月,声名鹊起……就诊者户限为穿”。在澳门的行医和施药体现了孙中山先生的“博爱”精神和早期的“人道主义”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在澳门行医的同时,还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他和葡国人法连斯哥·飞南弟(FRANCISCO H. FERNANDES)在下环正街3号合办了一份周刊《镜海业报》,逢星期二出版,每周刊登一篇由孙中山执笔鼓吹革命的文章,这份刊物远销中山、佛山、广州、香港、汉口、上海、福州、厦门以及新加坡、小吕宋、旧金山、葡萄牙等地,影响很大。

由于受到排挤,孙中山先生于1893年被迫离开澳门,前往广州洗基行医,并且在广州进行革命组织的筹备工作。

孙中山先生虽然在穗行医,但仍然常来往穗澳间,并保存澳门的“中西药局”,成为革命活动的据点。仍担任《镜湖业报》的匿名编辑和主笔,经常发表政治论文,抨击时局。

1894年冬,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之后,不久就回到祖国,策划武装反清起义。

原定于1895年10月26日(重阳节)在广州发难,后因消息泄露而失败,陆皓东被捕牺牲,孙中

山先生等受到清政府的通缉。孙中山先生于10月27日晚逃出广州,辗转于水路,第二天到达香山县小榄镇。在友人和同志的帮助下藏于“昭忠祠”内。后又越过凤山,绕道抵莺歌咀河边,登上伪装成运鱼草料的小船,一夜之间,孙中山先生安抵澳门。

他在澳门向葡国友人飞南弟求助,而飞南弟同时也得知清政府通缉孙中山的消息。据澳门历史学家、汉学家高美士记述,当时孙中山剪辫换服,扮成女装,由飞南弟陪同,乘渡船经香港借陈少白、郑士良赴日本。满清王朝在入关之后强迫全体中国人蓄发留辫,因此辫子成为效忠满清王朝的象征。孙中山先生剪辫标志着他与腐朽的封建制度彻底决裂。从此孙中山先生开始了他在海外的长期流亡的革命生涯。1905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为政纲,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先生手书同盟会纲领。在孙中山策划指挥下,同盟会在澳门成立了支部,租南湾街41号作为秘密机关,不少会员在澳门活动。

当时澳门有一位水上居民梁镜清,他参加同盟会之后,经常用自己的渔船秘密运送武器弹药,并借出自己的寓所——由义巷11号作为会员开会及通讯联络的地点。由于同盟会经济困难,梁镜清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家中的三艘渔船,全部变卖,捐献给同盟会,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在同盟会员潘才华开办的澳门“培基两等小学堂”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在学生中传播,1910年春,培基学堂公开邀请同盟会会员演讲,成为同盟会的革命讲坛。

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革命党的枪声震撼了满清皇帝的宝座。消息传来,大大鼓舞了澳门同胞,由同盟会发起在“清平戏院”举行了“澳门华服剪辫会”,赴会者达千人。同盟会成员在剪辫会上讲话,情绪极为高涨,受感动而当场剪去辫子的就有百余人。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民主和自由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辞卸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后,出任全国铁路督办,为中国的铁道建设日夜奔走。积极倡导民生主义。同年5月,孙中山先生由香港抵达澳门,应镜湖医院慈善会负责人卢廉若先生的邀请,下榻于卢九花园春草堂,广泛地会见了澳门各界人士,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孙中山先生在澳门期间,还到镜湖医院探望朋友和同志,欢聚一堂合影留念。澳门国父纪念馆和镜湖医院至今珍藏这些历史图片。在澳门逗留数天之后,孙中山先生返回阔别18年的故乡翠亨村,他在故居一楼住了三天,和全家团聚,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

1913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妄图恢复封建统治,孙中山先生看清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他从日本回国,策划反袁斗争,进行“二次革命”。1913年6月,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赴澳门,同当时的广东都督陈炯明在澳门附近海面的军舰上会晤,商谈讨伐袁世凯。之后孙中山先生还看望了病危在澳留医的长女孙姪,此行是孙中山先生最后一次访问澳门。但是孙中山先生的同志和亲友仍在澳门从事革命活动。据史料记载: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朱执信在1914年后曾长期在澳策划筹款买军火,设立讨伐军阀的秘密机构。此外,孙中山先生的岳父——宋耀如先生在世界各地活动,持的就是在澳门取得的葡国护照。

1919年5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发表“护法宣言”,同时命令他的儿子孙科到澳门以特派员的名义成立办事处,号召在粤海陆军起义响应,驱逐桂系军阀莫荣新。

孙科在澳门鹅眉街10号设办事处,联络各方面派来的代表,策动桂系军阀的舰队起义。7月15日停泊在肇庆的“江大”号军舰起义成功,18日上午江大舰驶到澳门,受到孙科等的欢迎。孙科在澳门为驱逐桂系军阀还做了不少工作,直至1920年11月粤军攻克广州,孙中山先生至上海回广州重组军政府之后,孙科才离开澳门回广州。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

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传出,举国悲哀。澳门各界人士和华侨于3月29日,假座镜湖医院开追悼会,商界下半旗休业致哀,到追悼大堂致祭的市民先后达2万多人,是澳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追悼会。

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独立富强,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奋斗,为他创立的三民主义革命思想,全心全意地为中华民族贡献了毕生精力,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得到海内外中国人的一致敬仰。

孙中山先生的长女孙姪,1895年生于香山故乡。就读于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成绩特优。1923年6月25日因肾疾逝于澳门。次女孙金琬,1896年生于檀香山,1921年在广州与戴恩赛博士结婚。戴曾任广州军政府外交秘书、梧州市长、海关监督、驻巴西公使等职。1949年后,戴恩赛、孙金琬旅居澳门,1955年、1979年先后逝世。孙中山先生的外孙女戴成功事母至孝,陪侍近半世纪,在90年代初逝世。

孙中山先生虽然已经去世,但是澳门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孙中山先生的足迹。

南湾的古榕树、草堆街的旧屋、妈阁庙前的港口、大三巴牌坊的石阶……都是历史的见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业绩,深深地铭刻在澳门的土地上。

包惠僧

柯高马路一怪人 澳门高士德马路和姑娘街交界处有一幢破旧的二层小楼房,门牌号:88。这一类楼房是30年代流行的样式,楼下沿马路的铺面作商业用途、二楼可以作住宅。几十年前,在当时经济不发达的澳门是很实惠的商住两用的楼房。近十年来,澳门经济起飞,这一类楼宇已经落伍,大部分都被拆除,建起了新楼。可是,88号仍像一位驼背的老流浪汉,蓬首垢面,衣衫褴褛,可怜兮兮地站在那里,与周围的新楼大厦相比,它显得那么寒酸、落魄、潦倒……

1948年时,澳门高士德马路又称为柯高马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柯高马路88号二楼租给了一家从中国大陆来的住户,当时中国大陆内战局势十分混乱,许多商人和官僚举家南迁。搬进柯高马路88号那家的男主人,年过半百,满口湖北话,举止谈吐不像商人,也不象官僚,倒像是一个贫穷的教书先生。他深居简出,即使偶然出外,行踪也十分神秘,戴着一顶礼帽,帽檐压得低低的,遮住眼眉,周围的邻居始终没有看清楚他的“庐山真面目”。

88号二楼的男人一不做生意,二不打工,每天早上到附近的“三盏灯”买一叠报纸就回家,楼下的人只听到他在楼上来回的踱步声……

给周恩来发出一份电报 1949年10月初,住在柯高马路88号二楼的神秘男人作出惊人之举,他在澳门向北京发出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

恩来兄鉴:兄等以廿余年之坚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领,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

包惠僧,何许人也?居然与周恩来称兄弟弟!当时受理这份电报的小姐肯定吓了一跳,难怪有人说:“澳门街藏龙卧虎。”

果然是藏龙卧虎之地!

包惠僧,何许人也?“包惠僧”这个名字怪怪地,像是一个出家人的名字,对于小城澳门的市民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在绿草如茵的校园里,笔者曾经问过一些澳门的青年人,他们回答是:“不知道”、“没听说过”、“算命先生”、“包惠僧大概是一个和尚吧。”也有的反问道:“是不是武侠小说里的人物?”这一群澳门青年主要的精神食粮是拙劣的公仔书(连环画)。我感到可悲。

当年住在柯高马路88号附近的邻居们,许多已搬走,剩下的也把包惠僧遗忘了。谁也没想到,包惠僧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既在共产党也在国民党政府中做过高官,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非等闲之辈。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1894年生,原名道亨;曾用过包晦生、包一字、包一德、亦愚等笔名和化名。1917年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了半年书,就到武汉当记者,给《汉口新闻报》、《大汉报》、《中西日报》撰稿。后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参加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仍回武汉当“无冕皇帝”——记者。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是骂湖北人的话,但是反映了湖北人的精明能干。包惠僧年青时精力旺盛,就像一只充满活力的“九头鸟”。

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 1920年秋,包惠僧和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武汉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的名称叫武汉共产党临时支部,包惠僧被推选为临时支部书记。

1921年1月,包惠僧由武汉到上海,准备赴苏联学习。到上海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汉俊留他在上海工作,请包惠僧任共产党教育委员会主任,负责选派优秀青年赴莫斯科留学的工作。4月份挑选了刘少奇、肖劲光等一批青年,由上海坐船到海参崴,再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去莫斯科留学。30多年后,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肖劲光任海军司令员,这是后话。

1921年5月,包惠僧到广州,与陈独秀一起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并在《新青年》杂志和《群众》社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筹备期间,包惠僧做了大量实际工作。

他曾和毛泽东平起平坐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市望志路106号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七个地区13名代表,包惠僧和陈公博、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刘仁静、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两名外国人: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一共15人。在这次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身在广州的陈独秀被选为中共总书记。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包惠僧和毛泽东地位相同,表现各异。27岁的包惠僧发言活跃,28岁的毛泽东则沉默寡言。

中共“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回到武汉,担任湖北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回到长沙,主持湖南共产党的工作,两人为了党务也常有书信来往。1922年春,毛泽东遭湖南警方通缉,避居武昌黄土坡包惠僧的办公室,他们同住了十余天,朝夕相处十分融洽。工作之余,包惠僧陪同毛泽东游览逛街,包惠僧还请毛泽东下馆子吃饭,给当穷教书匠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直到30年后,毛泽东对武昌的鱼和豆皮还是念念不忘,赞不绝口。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周恩来曾经担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可是包惠僧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却鲜为人知。

1925年2月,蒋中正、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留下校本部的学生无人管理。其间,廖仲恺曾给蒋中正发了电报,要周恩来回黄埔,蒋复电报说前方工作重要,周恩来不能回来,于是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前方主任周恩来,后方主任包惠僧。6月,派军校留校学生参加粉碎“刘杨叛乱”。平定“刘杨叛乱”后,军校学生全部回校复课,周恩来调任第一师党代表。于是,整个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全部由包惠僧负责,那时他才31岁。

黄埔军校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材。中共十大元帅中四位: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和林彪,都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过,当时他们都是包惠僧的部下和学生。

他脱离了共产党 包惠僧当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后,官运亨通,历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可是好景不长,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五月夏斗寅叛变”。跟着是“马日事变”、国民党“清党”、包惠僧被“清”了出来,先后到湖北老家黄冈、江苏高邮、上海等地避难,当时,他看不到共产党在中国的前途,不久就脱离了共产党。

为了生活,包惠僧在上海帮助贺耀祖办《现代中国》杂志;后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幕下任参议。1931年,借助他与蒋中正在黄埔军校时共事过的关系,任蒋中正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谋。“九·一八”事变后,蒋中正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因为包惠僧过去曾经是共产党员,所以国民党并不信任他。包惠僧在国民革命军内官阶为中将,也算高级将领,但没有什么实权,只担当幕僚的角色。

急流勇退,栖身澳门 1936年,包惠僧由军界退役,转任文官,先任内政部参事,后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人口局是一个清水衙门,没有油水,也没有权势,每月领官饷混日子。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包惠僧做中国的人口局长,掌握四万万人口的花名册,尽管资料不全,统计不准确,但是名义上,这个局长还是很威风的。虽然做了人口局局长,但是包惠僧对人口问题没有什么研究,政绩平平。他当然做梦也没有想到40年后,中国“人口大爆炸”,达到近12亿人口的天文数字。

1948年国共内战激烈,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见势不妙,申请遣散,带着家眷逃到澳门避难。栖身于柯高马路88号二楼,静观国内政局变化,有时闷得发慌,包惠僧就到新马路中央酒店的赌场里转一圈玩两铺。那时候还没有葡京赌场,当时澳门最大的赌场就在中央酒店。

冤家路窄,赌场巧遇 包惠僧到中央酒店里的赌场碰运气,可是他的手气不佳,输多赢少。一天他刚玩完,离开赌台站起来想走,抬头看到一张熟悉的圆脸——许克祥,真是“冤家路窄”,当年共产党的死对头,发动长沙“马日事变”的许克祥团长原来也在这里赌钱。

许克祥原是军阀唐生智的部下,“马日事变”之后投靠蒋中正,在北伐军中,许克祥是“右派”,包惠僧是左派,21年前兵戎相见,21年之后赌场相聚,当年在战场上拼个死活,今天在赌桌上决一雌雄。北伐路上的“左派”和“右派”在澳门都变成了“逍遥派”,这种戏剧性的转变是对中国现代政治最大的讽刺和嘲弄。

中国现代史上不少自封的“政治家”,他们把战场当作赌场,把人民和士兵当作赌注,他们的政治资本一旦输尽,就逃到澳门继续搏杀,赌城澳门成为昔日中国政坛的缩影。许克祥投靠蒋中正后,从团长升为师长、军长、总指挥,后来他的军队打光了,就收拾细软,带着老婆儿女到澳门买了房子,置了产业当寓公,日子仍然过得十分舒服,在赌桌上一掷千金。相比之下,包惠僧益发显得穷困潦倒,为此,包惠僧深受刺激,感到忿忿不平。

其实这不算什么,更大的刺激接踵而来。

他原来可以登上天安门 收音机传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的声音,报纸上登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的照片,包惠僧百感交集、彻夜不寐。

28年前,和包惠僧一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朋友、同事、部下和学生,居然当上了中国的主席、总理、部长、司令……大权在握,呼风唤雨。

而眼下栖身于赌城——澳门的包惠僧，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真是俗语所说：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一念之差押错了宝 凭包惠僧的资格和才能，他原本是可以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扶着汉白玉栏杆检阅三军，接受“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可是命运居然和他开了这么大的玩笑，唉！阴差阳错，一失足成千古恨，谁让他在1928年“一念之差押错了宝”。如今他只能心惊胆战地躲在澳门柯高马路88号这破旧的小楼上，他从大陆带出来的钱不多，坐吃山空，捉襟见肘，整天为全家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生抽王而操心，惶惶不可终日，台北他不想去，北京他不敢去。落到这般地步，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吞下这口气。包惠僧左思右想，终于提笔起草了给“恩来兄”的电报。

大陆出现了一个“栖梧老人” 自从包惠僧在1949年10月给“恩来兄”发了一份电报之后，11月份包惠僧全家从澳门柯高马路88号二楼悄悄搬走了。

邻居不知他们去了哪里，日子一久，邻居们逐渐把这一家人淡忘，包惠僧似乎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和专家并没有忘记包惠僧，他们不断的搜寻包惠僧的踪迹。1957年，北京出版的《新观察》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栖梧老人”的文章，题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这篇文章和作者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经过海外专家的分析、判断和考证，确认“栖梧老人”是包惠僧的笔名。

西方专家的判断没有错，“栖梧老人”就是包惠僧。

忍痛烧毁陈独秀来信 包惠僧回到大陆后，经过思想改造，先安排他做内务部参事，后任国务院参事，都是没有权的闲职，主要工作是写回忆录。因为他年青时当过记者，参与了中共筹建工作，又参加过中共“一大”以及1927年7月之前中共上层的重要活动。因此他的回忆录具有历史价值。

回大陆后，周恩来和董必武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还请他吃饭叙旧，可是包惠僧一直有自卑心理，甚至于不敢提笔写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直到1957年才用“栖梧老人”的笔名第一次发表回忆文章。

尽管包惠僧回大陆后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但还是劫数难逃。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包惠僧受到很大的冲击，“革命派”不仅贴了他的大字报，还用拐棍将他打了一顿。从此他一蹶不振，精神崩溃，吓得连夜将珍藏40年的陈独秀给他的100多封信塞进火炉中焚毁，这一批重要的历史资料顷刻之间烧成灰烬，化作一缕青烟。

自1920年以来，包惠僧40年间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历史变幻沧桑，但他始终把陈独秀的信带在身边，精心装裱好作为传家之宝，没想到“文革”之初竟毁于一旦。

岂止烧掉一百万美元 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和包惠僧私交甚笃，自1921年陈独秀在广州指派包惠僧参加中共一大开始，20年间书信来往不断，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党籍之后，晚年隐居在四川江津县，门庭冷落，贫病交加，临死前，包惠僧是唯一去探望他的老朋友。

陈独秀不但是创建中共的元勋，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著名的学者、教授，还是精通日、英、法三国语言的大学问家。陈独秀的墨宝传世不多，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在目前的国际文物市场上，陈独秀的100多封亲笔信，至少值100万美元。

包惠僧在“文革”中烧掉的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文物和物质财富，实质上是将他年青时代的理想、事业、友谊和精神财富全部付之一炬。包惠僧就像《红楼梦》尾声中林黛玉，“焚了诗稿，断了痴情；泪哭干了，债还完了”，真正到了“人去梁空巢已倾”的时候，他不想，不怨，不恨，不忿，完全是失魂落魄的样子，眼光呆呆的，恍惚若梦……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35年前那个“无冕皇帝”的一丝气息。

老不死的,你瞎了眼 包惠僧在“文革”中大难不死,居然熬过了十年浩劫,但已经是元气殆尽,只剩下一个多病的躯壳。大约是1978年的夏天,我和学生时代的挚友在北京新街口大街散步,看到一位年迈的男人穿越马路时因为动作缓慢差一点被汽车撞死,汽车司机急刹车后,探出脑袋大声咒骂那位老人:“老不死的,你瞎了眼……你找死啊,你活腻了趁早去八宝山……”

老人默不作声,承受着年青司机刻毒的污言秽语,头也不回,仿佛没有听到。

我和挚友以同情的目光注视着这位默默远去的老人。良久,挚友回头对我说:

“你知道这个老头是谁吗?”

“谁?”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包惠僧。”

“什么?他就是包惠僧……可怜的老头!”

由于匆忙,包惠僧的五官我都没有看清楚,记忆中只留下一个抖抖索索的背影,消失在芸芸众生的一片灰蓝色尘埃之中……

一年之后,听说包惠僧因病去世,终年85岁。成为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第12位离世者。

小楼的启示 经过40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澳门柯高马路88号这幢楼房依然存在,但是他的寿命也屈指可数,迟早会被推土机铲除。在尚未夷为平地之前,它能不断地提醒路过这里的澳门居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温故知新,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历史和澳门历史。

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像黄河东流,经历了无数曲折,走了许多弯路,千千万万热血青年成为黄河神坛的祭品,为此失去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中华民族为了认识一些简单的道理,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太昂贵了!

澳门柯高马路的88号二楼的一位神秘人物——包惠僧,他坎坷的一生,不仅为笔者提供了一个充满离奇情节,带有悲剧色彩的报告文学素材,还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